

密探·谣言·报刊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的信息传播

殷晴（日本津田塾大学非常勤讲师）

序言

1860（咸丰十）年8月，清朝首都北京笼罩在紧张之中。英法联军节节北上，已逼近天津。四年前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

8月16日，在京任职的李慈铭听说联军已从天津附近的北塘登陆。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下了对异常事态的忧虑与缺乏可靠信息的愤懑：

比来军警日至，枢府深秘不泄，朝官无知其事者。……以宰相备戎，事体郑重。而外间不知其所统何兵，所守何地，亦古来未有者也¹。

信息不足导致的焦躁情绪在同时期的北京居民日记中多有所见。当时了解国内局势的最主要手段是邸报，但其中却未刊登任何有关英法联军的消息²。即便是曾位居体仁阁大学士的翁心存也难以得知清廷的对策，只得在日记中感叹“惟见羽檄交驰，使车骆驿而已”³。

与此同时，上海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却在持续追踪战争的最新进展。就在翁心存写下上述日记的同一天，《北华捷报》刊登了题为《大捷，占领大沽炮台》的新闻，报道了8月21日的大沽炮台之战以及英法公使的动向⁴。该报还于9月3日特别增刊号外，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战争报道。

由此可知，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但在华西人却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掌握了更为详细和准确的信息。中西方的信息差不仅在民间，也存在于政府层面，对清廷的政策制定和国人的时局认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考察第二次鸦片战争，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众所周知，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之一。1860年代后，清廷开始局部的体制改革，直接原因便是此次战争的失败。由于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向来备受瞩目，坂野正高、黄宇和、茅海建等先学已经基本还原出了中英双方的外交谈判和军事行动的具体过程⁵。

¹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商务印书馆，1936）第9册庚集下，十三叶a，咸丰十年六月三十日。

² 吴可读《罔极编》（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66页。夏燮《中西纪事》（岳麓书社，1988）199页，卷之十五“庚申换约之役”。

³ 翁心存（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2011）1541页，咸丰十年七月十六日。

⁴ “Gulf of Pecheli. Great Victory. Capitulation of the Taku Forts”, *North-China Herald*, 1 September 1860.

⁵ W. C. 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矢野仁一『アロ戦争と円明園』（中央公論社、1990、初版为1939年）。宫崎市定「英仏連合軍

不过，虽然研究成果丰硕，但有关战争期间信息传播状况的论述却为数不多。外交谈判和战争的相关信息如何被收集？如何在政府内部传递？又如何向政府外部扩散？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清政府政治决策的实际情况，也是考察清朝的信息传播机制时不可或缺的一环。

有关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信息传播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交流史领域。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出版的《海国图志》（50卷本1842年刊行，60卷本1847年刊行，100卷本1852年刊行）和《瀛寰志略》（1848年刊行），以及新教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出版的中文书刊，都是当时向中国乃至东亚介绍西洋信息的重要媒介，中日学界均有详细研究⁶。然而，正如下文所述，这些信息在清朝的对外谈判和战争中并未得到有效利用。

政治史研究注意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和浙江官员蓄意隐瞒、歪曲战报的现象，指出前方的虚假信息是清廷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⁷。这一分析视角给了本文极大启发，但虚假报告频发的制度性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给既有的信息传播模式带来的变化等问题仍未得到充分探讨。此外，以往研究多着重分析前线官员的报告，而较少关注清朝中央政府的信息处理和信息发布。

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分析第二次鸦片战争开战前，中英两国分别以何种形式、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对方的信息。接下来将战争分为四个阶段，重点考察清朝的信息收集与信息发布情况⁸。

の北京侵入事件——特に主戦論と和平論」（同『アジア史研究 第二』同朋舎、1963、初版为1940年）。Masataka Banno, *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坂野正高『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岩波書店、1970）。同『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ヴァスコ・ダ・ガマから五四運動まで』（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J. Y. Wong, *Yeh Ming-ch'en: Viceroy of Liang Kuang (185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J. Y. Wong,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

⁶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8–223页。劉建輝『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の「近代」体験』（講談社、2006）58–127頁。

⁷ 佐々木正哉「鴉片戦争の研究——英軍の広州進攻からエリオットの全権罷免まで（二）」（『近代中国』第6巻、1979）。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12–361页。村上衛『海の近代中国——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103–134頁。注5茅海建前掲书，129–165頁。

⁸ 本章频繁使用的史料，除注2前揭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外，主要为以下7种。

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四国新档》英国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④Great Britain, *Parliamentary Papers*, No.33 (2571),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859);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CESM*. ⑤Great Britain, *Parliamentary Papers*, No.69 (2587), *China. Correspondence with Mr. Bruce, Her Majesty's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in China*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860);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CCMC*. ⑥Great Britain, *Parliamentary Papers*, No.66 (2754),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 1859–1860*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861);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CRAC*. ⑦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FO 17, General Correspondence: China. 此外，除特殊情况外，本文中的

1. 开战前的信息差

(1) 英国：培养专家、通过报刊共享信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及附属条约，两国由此进入“条约关系”时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被开放为通商口岸，香港岛被割让。英国向五口派遣了领事，并任命香港总督兼任驻华公使。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外交机构中缺乏中国问题专家，在谈判中不得不依靠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能力和汉学知识⁹。而战后的14年间，驻华使馆则独自培养出了一批专业人才。其中，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和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三人在情报收集和分析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威妥玛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战后在香港担任翻译官，同时致力于为英国政府培养译员。巴夏礼和李泰国都在十几岁时来华，在中国学会了汉语，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分别担任广州领事和上海总税务司。三人不仅可以将中文英译，还能用中文撰写文件，在中国的政商两界均有人脉¹⁰。

这些专家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除了汇报给英国当局，也将其中的一部分通过英文刊物提供给了在华西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文报刊大多在广州刊行。1844(道光二十四)年后，香港成为了新的报业中心，新兴贸易港上海也从1850(道光三十)年开始发行《北华捷报》¹¹。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熟悉中国事务的传教士，以及威妥玛等使馆成员的文章经常以投稿或转载的形式见诸报端¹²。

中国问题专家的分析文章与报纸编辑的评论、读者的来信和各种官方公告共同构成了英

上谕与奏折均引自《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其中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

⁹ Uganda Sze Pui Kwan, “A Requisite of Such Vital Importance’: The Want of Chinese Interpreters in the First Anglo Chinese War 1839-1842”, in Lawrence Wang Chi Wong (ed.), *Towards a History of Translating: In Celebration of 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Hong Kong: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¹⁰ 关诗珮《翻译政治及汉学知识的生产：威妥玛与英国外交部的中国学生译员计画(1843-187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1期，2013)。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Boston: Little, Brown, 1969)。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Vol.1, p. 166.

¹¹ Frank H.H. King (editor) and Prescott Clarke,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22-1911*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65), pp. 15-31, 78-79. 《北华捷报》由英国商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于1850年8月创办，1859年被指定为英国高等领事法院和英国领事馆刊登各种公告的机关报(Official Organ of all Notifications)。该报有时遵照英国当局的指示报道外交事务，但也发表了一些反对当局的社论，还刊登美国等其他国家读者的来信。

¹² 例如，《北华捷报》曾在1858年到1859年期间刊登过三篇分析北京的粮食供给的无署名文章。三篇文章实由威妥玛执笔，被提交给了英国政府。“Grain Supply of Peking”, *North-China Herald*, 31 July 1858; 14 August 1858. “Supply of the Capital”, *Ibid.*, 24 September 1859. “Memorandum on the Grain Supply of Peking”, 6 January 1860, enclosed in Bruce to Russell, 6 January 1860, *CRAC*, pp. 14-15.

文报刊的版面，既为在华西人提供了有关清朝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最新消息，也向欧洲本土描绘出了一幅中国图景。1840-50年代，各报的共同论调是批评清政府阻碍对外贸易、歧视西方人，由此塑造出的反自由贸易、妄自尊大的“天朝”形象不仅进一步加剧了在华西人对清政府的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¹³。

(2) 清朝：缺乏专家、有限范围内的信息共享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朝中央政府没有专门的外事机构，与西洋各国的往来主要由通商口岸的地方官负责。总管五口通商事务的两广总督（兼任管理各国通商事务钦差大臣）与英国驻华公使平级谈判，各种日常事务则由管辖各口岸的道台与派驻当地的领事协商进行。

在上述制度框架下，道台在对外交涉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和自由，身为上司的总督和巡抚并不一定总能把握实际情况。但道台无权直接上奏，交涉过程需由督抚向清廷汇报，而本就缺乏第一手信息的督抚又往往会在奏折中进一步歪曲或隐瞒事实。特别是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对外强硬派在清廷中枢占据主导地位，如实报告愈发困难¹⁴。其结果就是，清廷中积累的涉外信息越来越偏离各口岸的实际情况。

与英国外交当局通过报刊与民间社会共享信息的做法不同，清政府几乎从不公开涉及西洋事务的信息。《南京条约》及其附属条约从未被公布，此后的种种谈判，汇报谈判过程的奏折鲜少刊诸邸报，谈判的结果通常也不会以明发上谕的形式公布¹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有关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上谕、奏折，即便是提及了战败，也在邸报上连续出现¹⁶。换言之，在涉及西洋事务时，清廷并非将信息分为“正面”、“负面”而有意隐瞒后者，而是一律禁止所有信息的公开。

涉外信息不仅不向民众公开，在清政府内部的共享范围也极其有限。1859（咸丰九）年，刚刚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在奏折中如此描述各地官员的信息掌握情况：

¹³ King and Clarke, *op.cit.*, pp. 1-14, 49-63, 79-81. 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07-108, 174. 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¹⁴ 1840-50年代上海道台（苏松太道）在对外交涉中的作用，参见以下研究。Leung Yuen-sang, *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the Changing Society, 1843-9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37-66. 歪曲事实的问题也见诸内政领域，但在事关对外交涉的奏折中尤为显著。关于这一现象，注5前揭坂野正高『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57-138页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关于咸丰帝即位后清廷的排外倾向，参见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杂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35-51页。

¹⁵ 每天的邸报都有多个版本，难以详尽考证。不过，翻阅道光、咸丰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可以发现大部分有关对外交涉的上谕和奏折都是廷寄和密奏。考虑到邸报只刊载明发上谕和不涉及机密的奏折，可以推测与西洋有关的公文很少出现在邸报上。此外，笔者查阅了收录有1852至1889年间抄本邸报的《邸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确认咸丰年间的邸报中甚少出现涉及对外关系的上谕和奏折。

¹⁶ 《邸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中收录有大量此类上谕和奏折。翁心存、李慈铭等人也常在日记中提及通过邸报获知太平天国和捻军的相关信息。

自道光年间英夷犯顺以至五口通商，一切皆系密奏，并不互相关会，亦无卷据可考。甚有同官一处而不知其详者，以致歧途百出，枝节横生。该夷即借为口实，肇衅要求，实为办理夷务一大弊¹⁷。

有关西洋事务的政策讨论，基本上均以密奏-廷寄的形式，在清廷中枢（皇帝、军机大臣及几位亲王）和少数几位主管官员的小范围内进行。其他相关部门只能获知中央政府的最终决定，而无法掌握谈判过程的具体信息，各部门之间也几乎没有交流。

在此情况下，民间获取西洋信息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其一是传教士刊刻的书刊，1811至1860年间共出版了137种。其二是中国士人编撰的书籍，代表作即是前文提及的《海国图志》和《瀛瀛志略》。在当时的东亚地区，这些书刊是了解西方的宝贵信源。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许多幕末志士都曾热心阅读，但在清朝的士人之间却反响冷淡¹⁸。此外，传教士出版的中文书刊旨在介绍西方的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读者很难想象同时出版的英文报刊中充满了对清政府的激烈批判。

综上所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英两国的差距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上，也存在于信息领域¹⁹。英国拥有训练有素、精通汉语的人才，并通过实地观察和文献研究不断掌握最新的一手信息。相比之下，清朝没有培养通晓英语的官员，也没有熟悉西洋事务的专家²⁰。涉外信息基本上只在通商口岸的主管官员和清廷中枢间传播，且真伪混杂。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国便在信息积累上占据了优势²¹。16年后依然如此。

2. 亚罗号事件后的信息收集与信息处理

1856（咸丰六年）年10月8日，广州水师以抓捕海盗为由搜查了自称英国船籍的商船亚罗号，并扣留了大部分船员（均为华人），此即“亚罗号事件”。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直对贸易和外交的发展感到不满的英国人，在这次事件中找到了再次发动战争的口实。广州领事巴夏礼和香港总督包令（John Bowring）一再强硬抗议，两广总督叶名琛也坚不让步，谈判最终破裂。从10月22日到12月，英军持续炮轰珠江炮台和广州城。

1857年2月后，除了6月在珠江上发生过一次武装冲突外，广州的局势一直平稳。但战争准备其实正在步步推进。3月，英国正式决定开战。7月，全权大使额尔金（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抵达香港。11月，因镇压印度民族起义而延误的远征军在香港集结完毕，法国也以传教士在广西被杀害为由宣布参战。12月12日，英法联军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遭到

¹⁷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4册，18页，何桂清奏，咸丰九年一月二十日。

¹⁸ 注6熊月之前揭书，74、122-123、129-132、135、141-144、160-165、189-207、217-218页。注6刘建辉前揭书，58-127页。

¹⁹ 关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海军，参见横井勝彦『アジアの海の大英帝国——19世紀海洋支配の構図』（同文館、1988）。

²⁰ 曾在僧格林沁营中协理军务的郭嵩焘，甚至在1859年的奏折中评价当时的情况为“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无悉其语言文字者”。《四国新档》英国档，855页，郭嵩焘奏，咸丰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受理。

²¹ 黄イエレム「プロテスタント宣教師による中国関連知識の構築——アヘン戦争以前の時期を中心に」（東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論文〔未刊〕、2019）297頁。

拒绝。12月28日，联军发起进攻，次日占领广州城²²。

(1) 广东当局的形势判断

本节的关注点是：1857年12月，广州是在几乎不设防的状态下遭到联军进攻的。也就是说，同年2月以来，叶名琛没有调集军队，没有积极组织团练，也没有向中央政府寻求支援²³。缘何如此？

一种可能性是，由于广东及周边省份叛乱不断，可调集的军队数量有限。然而，1854年天地会围攻广州时，叶名琛集结了15000兵力（包括八旗、绿营和乡勇），又从周边地区调集了约5000名士兵，中央政府也从广西、福建、湖南和江西征调了约7000人的支援部队²⁴。由此可见，叶名琛决定不在广州城投入兵力，并不单纯是因为人员不足，而是基于他的形势判断。

直到1857年12月28日广州城沦陷，叶名琛的判断都是：英国无力开战。7月至8月，广州流传着英国人在印度吃了败仗的谣言，叶名琛信以为真。11月，英国舰队抵达香港，人们又纷纷传言英军将要攻打广州，大行商伍崇曜也向叶名琛汇报了这一消息。然而，叶名琛认定英国人只是在虚张声势。12月12日最后通牒发出后，联军战舰陆续驶入珠江，“英法两国旗帜布满河面”²⁵。兵临城下，叶名琛却于27日提交了一份约6000字的奏折，称英国在印度遭遇惨败，英女王命额尔金与清朝议和，法国无意支持英国²⁶。同一天，他还信心十足地向下属讲述了同样内容²⁷，可见奏折中所写并非蓄意捏造，而是他相信果真如此。

那么，叶名琛为何会对这些与事实不符的消息坚信不疑呢？曾在1849–1850年间担任广东按察使的祁宿藻的一封书信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1851年，祁宿藻被调往湖南，赴任前在北京受到了咸丰帝的召见。在给叶名琛的信中，他详细记录了与皇帝的对话。

咸丰帝：你可知道他们（=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与洋人）【在往来照会中】写了什么？（笔者按：（=）【】内为笔者的补充说明。下同。）

祁宿藻：徐、叶二人办理夷务极重保密，所有照会均私下协商。臣与藩司、道台虽同驻一城，事前亦无从知晓。……从前夷务往往未经办理便先遭泄密，今则督抚身侧之人亦难探知，夷人更无从措手。而彼等消息，吾人则已备悉矣。

咸丰帝：何以备悉？

祁宿藻：夷人有一物，名曰“新闻纸”，政务皆详载其上，可为吾人购买。夷人事事须赖吾国人翻译，徐、叶遂令受雇于夷人者逐月私通消息。故夷人一切，皆为吾人所知。

咸丰帝：受雇于夷人者，为何愿与吾人通信？

²² 事发当天，亚罗号的香港牌照已经过期。包令明知此事，却对广东当局故意隐瞒。信息的不对称对谈判产生了重大影响。Wong, *Deadly Dreams*, pp. 43–66.

²³ Wong, *Yeh Ming-ch'en*, pp. 172–173, 184–187. Frederic Wakeman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 159–163.

²⁴ Wong, *Yeh Ming-ch'en*, pp. 97–99.

²⁵ 华廷杰《触蕃始末》（《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178–179页。华廷杰时任南海知县。

²⁶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118–129页，叶名琛奏，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²⁷ 《触蕃始末》179页。

祁宿藻：只须每月予以赏金数百元即可。一处消息不足，他处亦有消息送来。各处消息一致，则可信矣。

咸丰帝：新闻纸由夷字写成？亦或汉字？

祁宿藻：已译成汉文²⁸。

“一处消息不足，他处亦有消息送来”，说明广东当局雇佣的密探不止一人。祁宿藻任职广东时，叶名琛尚为广东巡抚。他在 1852 年升任两广总督后亦自信宣称“从前林文忠公好用探报而反为探报所误，偏听故也。我则合数十处报单互证，然后得其端绪”²⁹，英国人在两广总督衙门缴获的大量探报也证明他所言非虚³⁰。1857 年，一名广东通事因被怀疑是叶名琛的密探而被港英当局逮捕³¹。结合祁宿藻的叙述，可以推测叶名琛雇用的密探大多是在英国使馆和洋行工作的中国人。

根据祁宿藻的叙述，密探提供的信息中，“新闻纸”尤其受到重视。这一点在叶名琛升任两广总督后也没有改变。例如，1854 年 7 月，叶名琛在上奏中汇报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英俄关系，自称“连日密够得新闻纸数张，始知颠末”³²。1857 年广州城陷落前，他还在向下属夸耀自己的情报搜集能力，称“十年前一切新闻纸我全收起”³³。

正如祁宿藻所说，密探给了广东当局极大信心。然而，叶名琛的知识储备使他并没有足够能力去核实信息的真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新闻纸”的认知。在前述 1857 年 12 月 27 日的奏折中，叶名琛写道：

近日英国新闻纸愈加密秘。编列号数，封锁在筐，非当议事之朝，各夷官皆不能取阅，外间更无从购览³⁴。

这条消息可能也来自密探。在涉外信息不公开的清朝，这种描述可能更符合叶名琛对“新闻纸”的想象。由此可以推测，缺乏最基本知识的叶名琛，恐怕很难对各路探报做出全面分析和准确判断。

英国人从两广总督衙门缴获的探报显示，密探们提供的消息五花八门，其中既有对额尔金

²⁸ 英军占领广州后没收了两广总督衙门中的各种文件，此信即为其中之一。这些被扣押的文件有些被归还给清朝，有些则现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FO 682 与 FO 931）。其中，FO 931 所藏部分以影印形式收录于刘志伟·陈玉环主编《叶名琛档案》（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但其中未包括祁宿藻的这封信件。上述引文乃是由威妥玛的英译重新翻译而成。“Report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Emperor Hien Fung and Ki Shuh-tsau, ex-Judge of Kwang-tung, in 1851”, enclosed in Elgin to Clarendon, 30 March 1858, *CESM*, p. 235. 关于这些文件的英译过程以及给中英谈判带来的影响，参见 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7–61.

²⁹ 同注 27。

³⁰ J. Y. Wong, *Yeh Ming-ch'en*, pp. 176–177.

³¹ FO 17/277, Elgin to Clarendon, 9 December 1857. Laurence Oliphant, *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 '58, '59* (Edinburgh: W. Blackwood and Sons, 1859), Vol.1, p. 97.

³² 《四国新档》英国档，184–185 页，叶名琛奏，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受理。这封奏折中包含了英国使者觐见俄罗斯国主时行“免冠跪拜”、英军出征当日“哭声振野”等虚假信息。

³³ 同注 27。

³⁴ 同注 26。

外貌的详细描述，也包括很多可能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误报，比如英国在印度遭遇惨败³⁵。英国外交当局似乎早就意识到了密探的存在，但就笔者管见所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故意放出了假情报³⁶。在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威妥玛将清朝密探提供虚假信息的原因归结为他们只说叶名琛想听的话，以及低下的情报收集能力³⁷。当时在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一直持续报道印度民族起义和英法联军的集结情况，因此即使英国当局故意向密探们散布了假消息，广东当局也完全可以通过对比报纸的公开报道来验证探报的真伪。

祁宿藻的叙述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涉及对外交涉的事务仅由督抚二人协商，藩臬两司和道台们均无法参与。叶名琛升任两广总督后，信息共享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广东巡抚也常常被屏蔽在外，几乎所有决策都由叶名琛一人制定³⁸。前引何桂清奏折所说的“甚有同官一处而不知其详者”，可谓广东的真实写照。广州城陷后叶名琛被追究责任，罪名之一即是未将英法投递之照会“会商办理，即照会中情节亦秘不宣示”³⁹。考虑到祁宿藻回答咸丰帝时的语气，以及他将问答内容告诉了叶名琛本人，可以推测叶名琛不与他人协商的做法此前并未引起过不满，反而被视为严防泄密的良策。

综上所述，叶名琛的形势判断主要基于密探提供的消息。探报中多有不实之处，叶名琛本人也缺乏信息的取舍和甄别能力。在制定对策时不与他人协商，等于切断了发现、纠正问题的可能性。以叶名琛为首的广东当局在信息收集和分析上的缺陷，可以说是广州城未经抵抗便被联军轻易攻占的重要原因之一。

（2）清庭的信息渠道

叶名琛被密探所误，而北京的清廷亦被叶名琛所误。从亚罗号事件爆发到广州沦陷，叶名琛一共提交了八份谈及英、法的奏折，其中不仅有来自密探的误报，也有许多他自己编造的谎言。例如，在1856年11月24日的奏折中，他谎称与英军交战，大获全胜，英军指挥官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阵亡。关于1857年6月发生在珠江的军事冲突，他一字未提清军的溃败，反而谎称“三次接仗获胜”⁴⁰。清廷未向广州派遣援军，不断误报和谎报的叶名琛应承担主要责任。

但是，中央政府完全没有可能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真实情况吗？

第一个可能的渠道是上海的英文报纸。1856年11月1日，《北华捷报》首次报道亚罗号事件，宣称这是对英国人的侮辱。11月15日报道了英军炮轰广州城，称赞“这是一个伟大而

³⁵ FO 17/277, Elgin to Clarendon, 9 December 1857. Wong, *Yeh Ming-ch'en*, pp. 176–177.

³⁶ FO 17/277, confidential, Elgin to Clarendon, 9 December 1857.

³⁷ Wade to Elgin, 10 March 1858, enclosed in Elgin to Clarendon, 18 March 1858, *CESM*, pp. 226–227.

³⁸ 《触藩始末》164–170、177–180页。

³⁹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7册，454页，咸丰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⁴⁰ 所有上奏中，目前可以确认全文的只有注26的奏折和同日提交的一份奏片。茅海建根据上谕档和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的记录推测出了其余7份奏折的主要内容。参见注5茅海建前揭书，148–151、163–165页。

激动人心的消息，为本社区注入了活力”。此后，该报一直持续关注广东和香港的事态发展，多次发表呼吁对华开战的论说和读者来信。1857年11月21日，《北华捷报》刊登出了集结在中国海域的英国舰队名单，详细标注了每艘舰船搭载火炮的数量。编者充满期待地写道：“风暴正在迅速聚集，很快就会席卷广州城”。

也就是说，《北华捷报》上刊登出的一系列消息——1856年末广州城遭到炮击、主要炮台陷落、在华英国人渴望战争、英国已做好开战准备——明显与叶名琛的报告完全相反。然而，没有迹象表明这些信息被汇报给了清廷。

第二个渠道是广东以外地方官员的报告。1856年12月，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联名上奏，援引包令的照会和上海道台收集的信息，称广州主炮台已经失陷⁴¹。这份奏折于12月24日送达北京，但已经收到叶名琛“捷报”的咸丰帝却不以为然，训诫二人勿为英人所惑⁴²。收到朱批后，两人上奏附和咸丰帝，批评包令的照会“夸大其词”，此后再未报告过广东的情况⁴³。

由此可知，清朝中央政府从一开始就封闭了广东以外的信息渠道，所做决定完全依赖于叶名琛一人的报告。1858年1月27日，《北华捷报》报道了联军占领广州城。16天后，咸丰帝才通过广州将军的奏折得知了这一消息，大为震惊。而此时，被联军俘获的叶名琛已经在英国军舰上被关押了22天⁴⁴。

3. 谈判信息的传播

占领广州后，英法联军会同美国和俄国代表前往上海，要求重新修订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被清廷拒绝。英法代表认为必须进一步向清朝施压，遂于1858年4月率舰队抵达大沽，在此地与清朝代表展开谈判。一个月后，谈判破裂，联军于5月占领大沽炮台，挺进天津。清廷最终任命内阁大学士桂良与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从6月初开始在天津重启谈判。同月底，清朝分别与四国签订条约，合称天津条约。

上述期间，清朝收集信息的主要方式是与四国代表的谈判，关于谈判过程已有详尽研究⁴⁵。因此，本节将重点关注信息的传播，考察有关谈判的种种信息如何扩散，又对清廷的政策决定产生了何种影响。

(1) 清廷的信息发布

清朝中央通过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把谈判的相关信息通知给了政府官员和一般民众？

⁴¹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94-95页，怡良·赵德辙奏，咸丰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⁴²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6册，336页，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⁴³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97-98页，怡良·赵德辙奏，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奏折也报告了1856年10-11月的广州炮击，但均为受到清廷的重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92-94页，韩锦云奏，咸丰六年十一月十八日。100-101页，王发桂奏，咸丰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⁴⁴ *North-China Herald*, 9 January 1858.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132页，穆克德讷奏，咸丰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⁴⁵ Banno, *op.cit.*, pp. 18-42. 注5 茅海建前揭书，174-188页。

正式的通知手段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明发上谕。7月3日，咸丰帝以廷寄形式正式批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的签署。在此之前，从未有明发上谕提及谈判正在进行。1月27日，清廷下发了革职叶名琛的明发上谕，其中提到“夷人竄入省城”，但并未说明“夷人”具体来自哪些国家、怀有何种目的⁴⁶。此后又连发数道人事调动的明发上谕⁴⁷，让人感觉大沽至天津一带正在发生与“夷务”相关的异常事态，但没有明确提及大沽炮台陷落和清朝与四国代表的谈判。

第二种通知手段是廷寄，接受者基本上仅限于各阶段谈判的负责人。具体而言，上海阶段为两江总督，大沽阶段为直隶总督，天津阶段则是两位钦差大臣以及负责首都防卫的僧格林沁。此外，5月22日的廷寄通知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大沽炮台已被攻陷，命他中止攻击英法联军的计划⁴⁸。每道廷寄都根据当时的谈判情况给出了具体指示，但对此前的谈判经过却少有解释。例如，2月时英国代表通过两江总督向清廷提出了18项要求，当大沽谈判期间这些要求被再次提起时，直隶总督却对前情一无所知⁴⁹。就笔者管见所及，与“夷务”没有直接关联的督抚们只接到了一次廷寄通知。6月11日，清廷以“夷船来至天津，京师办理防堵，需用较繁”为由，命四川、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督抚迅速筹拨京饷⁵⁰。

第三种通知手段是廷臣会议。根据坂野正高的考证，《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前共召开过两次。第一次为6月2日，会议决定组织“巡防处”维护北京的治安，任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负责京师防务，并决定派遣曾作为清朝全权代表签署《南京条约》的耆英前往天津⁵¹。会议的具体经过不详，但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心存日记中写道：“津门消息人言籍籍，问之朝廷，亦不甚分晓，殆秘不告人也”⁵²。由此可以推测，此次会议的重点是京师防务，而不是讨论谈判策略。第二次会议于6月23日，亦即《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三天前召开，军机大臣、王大臣、九卿、科道等100多人列席。会议讨论了应该议和还是开战，最终主和派占据了上风⁵³。

这样看来，清廷一直试图把谈判信息的发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然而，信息还是通过非官方渠道扩散开来。

⁴⁶ 同注 39。

⁴⁷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8 册，169-170 页，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185 页，四月二十一日。189 页，四月二十三日。217 页，五月七日。

⁴⁸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8 册，154 页，咸丰八年四月十日。

⁴⁹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 3 册，264 页，谭廷襄等奏，咸丰八年三月十九日。

⁵⁰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8 册，202 页，咸丰八年五月一日。

⁵¹ Banno, *op.cit.*, pp. 282-283 (footnote 169).

⁵² 《翁心存日记》第 3 册，1318 页，咸丰八年四月廿一日。

⁵³ Banno, *op.cit.*, p. 82. 根据李文杰《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333-335 页，廷臣会议原本被称为“大学士九卿会议”，参加者为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官员。而在召集6月23日的这次会议时，咸丰帝首次使用了“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的称呼，导致与会者人数超出以往。会议决定以耆英未经咸丰帝批准擅离天津为由，命其自尽。

(2) 非正式信息的扩散

英法使团带领舰队在大沽和天津附近停留了近三个月，许多当地民众都亲眼目睹⁵⁴。种种见闻口耳相传，自不难想象。

更为内部的消息则主要通过信件在政界传播。例如，在上海担任财政幕僚的吴煦的个人档案中保存有 11 封来自大沽和天津的来信。信件均在谈判期间发出，提供了很多包括具体会谈场景在内的第一手信息⁵⁵。又比如，四川布政使祥奎从北京友人的来信中得知了大沽炮台陷落的消息，又把这封信展示给了四川总督王庆云⁵⁶。

既是政治中心又接近谈判现场的北京，各路消息尤其混杂。翁心存一面在日记中频频感叹缺乏可靠的官方信息，一面又记录下了不少传闻，基本把握了大致的谈判过程⁵⁷。

然而，即使是官场内部的消息也存在许多不实之处，有关李泰国的信息即是典型一例。谈判期间，威妥玛和李泰国分别担任额尔金的汉文正使 (Chinese Secretary) 和汉文副使 (Assistant Interpreter)，李泰国因中文流利、态度蛮横而尤为引人注目⁵⁸。在吴煦收到的信件中，李泰国被描述为“实系广东潮州人，犯法逃去从夷者”⁵⁹。同时代的文献《中西纪事》记载他“实广东应州人，世効汉奸于外洋”⁶⁰。恭亲王奕訢在奏折中称其为“广东民人，世为通使，市井无赖之徒”，建议若他再有无礼之举，应“立即拏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⁶¹。

恭亲王的上述奏折表明，包括传闻在内的非正式信息也可能成为政策讨论的素材。此处再举一例。6月4日，桂良等人首次会见额尔金。6日，报告会面经过的密奏送达北京⁶²。6月12日，主战派代表人物、湖广道御史尹耕云上奏力陈备战的必要性，奏折开头便引用了桂良等人的密奏。然而，他的引用与密奏的原文多有出入。例如，密奏称额尔金“带领夷兵二百余人”参会，尹耕云则称“带兵三百余名”。此外，尹耕云的奏折中还写到一些密奏中完全没有提及的细节，如额尔金中断会面时“怒立中堂”，随行英军“作乐举枪，挥刀而去”⁶³。如果尹耕云正式阅览过桂良等人的密奏，上述引用方式显然十分反常。更合理的推测是，他并未亲眼见过密奏，而只是听闻了大致内容。这意味着，清廷中枢发生了信息的泄露。

另一例基于非正式信息的政策讨论是针对外国公使驻京问题的集体上奏。英国提出的所有条款中，咸丰帝最为看重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一项，一直坚不让步。然而，在英国的不断施压

⁵⁴ 关于外国人的到来给地域社会带来的影响，参见吉澤誠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統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50-54頁。

⁵⁵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277-288页。

⁵⁶ 王庆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点校）《荆花馆日记》下册（商务印书馆，2015）965页，咸丰八年五月十三日。王庆云在日记中称带来信件的人为“文澜”，此人即是布政史祥奎。

⁵⁷ 《翁心存日记》第3册，1303-1324页。

⁵⁸ 参见张志勇《李泰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北方论丛》2015年第4期）。

⁵⁹ 《吴煦档案选编》第5辑，285页。

⁶⁰ 《中西纪事》183页，卷之十四“大沽前后之役”。

⁶¹ 《四国新档》英国档，580页，奕訢奏，咸丰八年五月十三日受理。

⁶² 《四国新档》英国档，511页，桂良等奏，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受理。

⁶³ 《四国新档》英国档，543页，尹耕云奏，咸丰八年五月二日受理。

下，桂良等人终于在6月19日上奏，恳请接受此项要求⁶⁴。奏折于次日送达北京，立即成为“市井闲谈、士大夫清议”的话题⁶⁵。23日，至少有六份反对公使驻京的奏折被呈递御前⁶⁶。正是因为这次集体上奏，清廷才不得不召开了前文提到的第二次廷臣会议。在这些奏折中，以吏部尚书周祖培为首的24名团防处成员的联名上奏尤为引人注目。奏折开头如此写道：

窃臣等奉命办理团防，原为杜绝奸萌、肃清地面，夷务机密，未敢与闻。惟本月初十日，外间纷纷传言“抚局已成，各国夷使不日到京，相度地方，建立夷馆，常川往来，该夷使等一切体制与大学士平行”等语。虽虚实未能悬断，而重口汹汹，群情俱骇，不得不详度利害，为我皇上剴切陈之⁶⁷。

“重口汹汹，群情俱骇”，意味着桂良等人6月19日的上奏已广为人知。通常，这种情况只有在奏折被刊诸邸报，或是被明发上谕提及时才会发生。然而，没有迹象表明这份奏折曾被清廷公布。“虚实未能悬断”一文也暗示周祖培等人并未亲自阅读过奏折原文。由此可以推测，公使驻京条款的流传也是信息泄露的结果，泄密者很可能就是持反对意见的官员。

综上所述，清朝中央政府虽然几乎没有公开发布与谈判有关的信息，但也没有完全实现“密室政治”。泄密和基于非正式信息的政策讨论已经成为政界的默认做法。虽然能够参与最终决定的只有咸丰帝、军机大臣和少数几位亲王，但朝廷无法禁止其他官员们的上奏。当大臣们的建言超越了个人主张，而是以代言“众口”、“群情”的形式集体提出时，咸丰帝也就不得不召开廷臣会议，以此展示言路洞开的姿态。因此，没有进入政治核心的官员们虽然无法直接参与政治决策，但对政策的方向性施加了间接影响。

中央政府不公布谈判的背景和进展，核心决策层以外的官员们便只能依赖私人渠道获得各种非正式信息，所获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个人的人脉和信息收集能力。官员之间存在的巨大的信息差，始终贯穿于围绕天津条约的讨论之中。

4. 天津条约缔结后的信息扩散

天津条约签订后，中英代表转移至上海，进一步磋商税则等具体的贸易问题。经过一个月的谈判，《中英通商协定》于1858年11月8日在上海缔结。

不过，清廷真正在意的并不是今后的贸易发展，而是刚刚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对于这个条约，中英双方的认知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上海的英国人将条约视为巨大成功，满足地表示“我们已经没有更多要求”，乐观宣称“可以说中国现在真正开放了”⁶⁸。然而，在咸丰帝看来，签订条约不过是面对军事胁迫时的权宜之计。联军一离开天津，他便命令谈判代表们废除

⁶⁴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416-418页，桂良等奏，咸丰八年五月九日。

⁶⁵ 《四国新档》英国档，566-567页，桂良等奏，咸丰八年五月十日受理。583页，钱宝清奏，咸丰八年五月十三日受理。

⁶⁶ 同注65，579-588页。

⁶⁷ 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咸丰朝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679页，周祖培等奏，咸丰八年五月十三日。这份奏折也收录于《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和《四国新档》英国档，但上奏者均被简记为“周祖培等”。

⁶⁸ *North-China Herald*, 17 July 1858.

整个条约，或至少取消包括公使驻京在内的四项条款⁶⁹。

本节的关注点是：清朝中央政府如何向官员和民众解释天津条约的缔结？清朝官员和英法等国对此又如何反应？

(1) 两广总督的密探

英法联军撤出天津后，咸丰帝多次发布人事任免的明发上谕，以惩处责任人的形式承认了大沽炮台的陷落⁷⁰，但没有提及天津条约的签订。签署条约一事在政界迅速传开⁷¹，但只有直接参与了谈判的官员和核心决策层的少数几人才知道具体条款和在上海的谈判进展。一心想要废约的咸丰帝，自然不希望条约内容的公开。

然而，对于一些官员来说，能否把握天津条约的内容以及谈判的走向，对个人的仕途至关重要。叶名琛的继任者、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即是其中之一。当时他驻扎在广东惠州，暗中支持广州士绅们领导的抵抗运动⁷²。在7月5日和16日的廷寄中，中央政府通知黄宗汉：天津条约已经签订，分别赔款给英法两国白银400万两和200万两；将用粤海关的收入支付赔款；联军将继续占领广州，直到赔款全部付清；现在正在上海谈判贸易问题⁷³。廷寄没有提及赔款以外的条约内容和上海谈判的进展。为了获得更详细的信息，黄宗汉把自己的密探派到了上海。

密探名叫俞增光，官衔为县丞⁷⁴。他大约从1858年9月开始滞留上海，在11月底至12月初之间撰写了给黄宗汉的探报。探报应当先被送到了黄宗汉所在的惠州，后来不知为何又被寄到了广州。1859年1月初，英法联军在攻占广州的抵抗运动根据地石井时发现了这份探报，立即将其寄到上海⁷⁵。1月23日，额尔金把它推到了桂良等四位清朝代表的面前⁷⁶。

探报内容“纤细毕备”，令四人“不胜发指”。具体包括以下五点。（1）咸丰帝最初打算全面废除《中英天津条约》。（2）经过桂良等人的反复劝说，咸丰帝同意放弃全面废约，转而要求取消四项内容，即①外国公使驻京、②长江沿岸开设通商口岸、③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和经商、④英法联军占领广州，直至赔款还清。（3）英国代表将于1859年4月至5月间前往北京换约。（4）将制定新税率，并批准鸦片贸易合法化。（5）英国要求罢免黄宗汉，取缔广州的团练组织。记录准确无误，细致到了会谈和上奏的具体日期⁷⁷。

⁶⁹ 注5 茅海建前揭书，188-198页。Banno, *op.cit.*, p. 27-28, 93-107.

⁷⁰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8册，258页，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262页，六月二日。267-268页，六月六日。283页，六月十四日。284页，六月十六日。291页，六月二十一日。304-305页，六月二十八日。327-328页，七月十三日。

⁷¹ 郭嵩焘（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8册“史部四，日记一”（岳麓书社，2012）144页，咸丰八年十月四日。Bruce to Malmesbury, 31 May 1859, *CCMC*, p. 7.

⁷² Wakeman, *op.cit.*, pp. 164-173.

⁷³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8册，254页，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五日。267页，六月六日。

⁷⁴ 《吴煦档案选编》第5辑，4页。

⁷⁵ Consul Parkes to Elgin, 15 January 1859, enclosed in Elgin to Malmesbury, 22 January 1859, *CESM*, p. 475.

⁷⁶ 同注74。

⁷⁷ “Précis of a Letter found at Shek-tsing”, enclosed in Elgin to Malmesbury, 22 January 1859, *CESM*, pp. 475-477. “Translation of a Paper forwarded to the Earl of Elgin in Mr. Parkes Despatch of January

桂良等人其实早就意识到咸丰帝最看重的是公使驻京，因此在谈判时一直聚焦于这一点，对长江开埠等三项并未努力争取⁷⁸，这份探报却暴露了咸丰帝的真实意图。桂良在上奏时谈及此事，直呼“所有应办四事、如何设法之处均载其中，尽被该夷窥破，如何措手？”⁷⁹然而，黄宗汉和余增光事后似乎均未受到处罚⁸⁰。

(2) 天津条约的公开

另一位关注天津条约的官员是黄宗汉的继任者王庆云。由于英国一再要求解职黄宗汉，清廷于 1859 年 5 月将其调任为四川总督，前任川督王庆云则接任两广总督⁸¹。

王庆云于 5 月收到了正式的任命通知，但未被告知天津条约的内容⁸²。7 月底，一位法国传教士在四川散发《中英天津条约》的汉译本时遭到逮捕，尚未离川的王庆云这才第一次看到了条约全文⁸³。在日记中，他表达了对朝廷封锁消息的困惑和不满。

月前酉阳州报获佛夷丁成贤在彼刊布条约五十六款。虽不出自英夷，而其事已传播西南矣。今乃以此密而不宣，可谓亲远而疏近。此款难辨真伪，如何据以拟议。古人或议战，或议守，或议和，必身亲其事，经营数年而后定。若闭塞耳目、使人聋瞽，而贸然莅其事而谋之，其不愆事者鲜矣⁸⁴。

虽然清廷将天津条约的内容列为机密，但在华西人却在定约之后不即便将其公之于众了。《北华捷报》于 1858 年 7 月 13 日刊登出了条约的第 1-11 条、26-29 条、53-56 条的摘要，比王庆云从法国传教士处获悉条约内容早了整整一年。8 月 28 日和 11 月 13 日，又分别刊登出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英通商协定》的全文。

值得注意的是，《北华捷报》并没有得到条约的正式英文版本，而是获得了汉文版。刊登出的英文版本是编者根据汉文版自行英译的。报道中并未透露两份汉文版的来源，清朝和英国的官方文件中也没有提及此事。由于英国外交当局对《北华捷报》有一定影响力⁸⁵，因此可以推测，即使英方没有故意泄露文件，至少也是默许了报社的发布行为。

此外，西人还曾把条约全文随同历书一同散发⁸⁶。两江总督何桂清在 1859 年 2 月的奏折中汇报称，当时上海一带“各处传抄，皆从夷馆中得来”⁸⁷。西人如此希望条约内容在中国广为人知，或许是希望制造条约已被公布的既成事实，由此敦促清政府履行条约。

15, 1859”, enclosed in Bruce to Malmesbury, 13 July 1859, *CCMC*, pp. 25–28.

⁷⁸ 注 5 茅海建前揭书，195 页。

⁷⁹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 3 册，597 页，桂良等奏，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⁸⁰ 桂良等人最初本想追究俞增光的责任，但谈判代表之一的军机章京段承实则主张俞不过是遵循上官指示，不必惩处。《吴煦档案选编》第 5 辑，4 页。

⁸¹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9 册，160 页，咸丰九年四月二日。

⁸² 《荆花馆日记》下册，1034 页，咸丰九年四月二十日。1305 页，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⁸³ 《荆花馆日记》下册，1045 页，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⁸⁴ 《荆花馆日记》下册，1046 页，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⁸⁵ FO 17/315, confidential, Bruce to Russell, 22 November 1859.

⁸⁶ 《吴煦档案选编》第 5 辑，34 页。《中西纪事》202 页，卷之十六“天津新议续议”。

⁸⁷ 同注 17。

1859年4月，新任英国公使布鲁斯（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Bruce）带着经过维多利亚女王批准的条约原件抵达香港，准备按计划在北京交换批准书。但咸丰帝却要求把换约地点从北京改为上海。桂良等人认为，若能让英国人相信清朝的确有履行条约的诚意，或许他们会同意更改换约地点，而展示诚意的手段之一即是刊刻发行《中英天津条约》的全文。这大概也意味着，清廷此前拒绝公布条约的做法，被英国人视为缺乏诚意的体现。4月底，桂良等人来不及等到咸丰帝的许可便在上海刊行了《中英天津条约》⁸⁸。

然而，布鲁斯始终坚持在北京换约。6月，他与法国公使率领舰队北上。25日，英法舰队企图清除设置在海河河口的障碍物、强行突入大沽，遭到清军炮击，两位公使无功而返。此即第二次大沽之战。

事发之后，布鲁斯立刻在返回上海的军舰上撰写了说明冲突经过的报告书⁸⁹，抵达上海后又写了一份更详细的汇报。在第二份报告中，他再三强调清廷从一开始就无意遵守条约，并附上了一份重要证据——前述俞增光的探报⁹⁰。

由此可知，清朝中央在天津条约缔结后拒绝发布相关信息的做法，不仅引起了本国官员的混乱和不满，也加剧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不信任，并导致英国掌握了信息发表的主动权。清朝官员为弥补信息不足而派出的密探，最终却为英国送上了不利于清朝的证据。

5. 备战期间的信息收集与战后的条约公开

第二次大沽之战后，清朝与英法再次回到敌对关系。咸丰帝先是在1859年8月1日发给何桂清（当时的官衔为两江总督兼办理各国事务钦差大臣）的廷寄中下令废除《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又在8月9日以明发上谕形式公布了第二次大沽之战的爆发，将原因归咎于英法两国⁹¹。而英国和法国则要求清朝全面履行天津条约、向两国道歉，并追加赔款。为了确保这些要求的实现，两国决定再度派遣远征军。

清廷预见到了英法的报复，因此在远征军到达中国之前尽可能地收集敌方信息便成为当务之急。何桂清等负责官员试图通过正式访问和派遣非正式联络员的方式开启和平谈判并借机收集信息，但均未得到布鲁斯的回应⁹²。

⁸⁸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4册，51页，桂良等奏，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吴煦档案选编》第5辑，30、34、36页。

⁸⁹ Bruce to Malmesbury, 5 July 1859, CCMC, pp. 16–19.

⁹⁰ 英国驻华外交代表两次向外交部汇报了俞增光的报告。第一次是在该报告被送达上海后不久，以节译形式提交。额尔金根据这份报告判断，主战论者在清廷仍占据优势，同时评价桂良等实际负责谈判的官员“行事公正”。第二次则是以全文英译的形式提交，一同寄出的还有布鲁斯的报告和威妥玛的备忘录。二人均强调清朝在上海谈判的真正目的不是讨论税则，而是修改《中英天津条约》。参见注77。

⁹¹ 《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9册，349页，咸丰九年七月三日。367页，咸丰九年七月十一日。

⁹² FO 17/335, Bruce to Russell, 6 January 1860. FO 17/335, secret and confidential, Bruce to Russell, 21 January 1860. FO 17/336, Bruce to Russell, 6 February 1860. FO 17/336, Bruce to Russell, 6 March 1860. FO 17/337, secret and confidential, Bruce to Russell, 7 April 1860. FO 17/337, Bruce to Russell, 30 May 1860. FO 17/338, Bruce to Russell, 12 June 1860. 关于英国外交当局的非正式联络员，参

在此情况下，英文报纸成为了清朝的重要信息源。

（1）清朝官员对英文报刊的利用

负责管理英文报纸翻译事务的是刚刚升任上海道台不久的吴煦。翻译工作从 1859 年 7 月开始，至 1860 年 8 月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至少有 28 份译文被送到了吴煦手中⁹³。

吴煦向上司何桂清提交的第一份译文是《北华捷报》1859 年 7 月 9 日对第二次大沽之战的报道。文章由“愤怒号”（H. M. S. Fury）船长的简短报告和两名英国军人的叙述构成，公布了英法两国的伤亡人数（英军 464 人，法军 14 人）⁹⁴。何桂清在 7 月 15 日的奏折中引用了英法联军的伤亡数字，并附上了译文的摘要⁹⁵。这也是唯一一份明确提到了联军伤亡数字的奏折。

清朝官员通过英文报纸收集信息的行动引起了英国人的警觉。11 月 16 日，英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派遣远征军的消息被轮船带到了上海⁹⁶。11 月 19 日，《北华捷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同时宣言道：

至于这次战役的计划，就让他们从结果中去了解吧。届时叩头典礼将被废除，咸丰皇帝将乞求和平。我们不会向他们透露任何信息。我们相信，我们的竞争对手（=香港报界）也会谨慎行事，因为清朝官员能够获得本报和其他报刊上所有关于他们的文章的译文⁹⁷。

从此之后，直到联军部队从北塘登陆，《北华捷报》上所有关于联军动向的文章都转载自在英美发行的报刊，而没有任何原创报道。布鲁斯在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件中也提醒道：

我请求阁下在发表中国线人的言论时慎之又慎。这是因为英文报纸在被翻译成中文，以供中国当局所用。他们很容易追查信息的出处，这将给那些有可能成为我们宝贵助手的人带来致命危险⁹⁸。

尽管英国加以防范，清朝还是从英文报纸上获得了一些关于联军的信息，其中最重要的是附在何桂清 1860 年 3 月 13 日奏折中的译文汇编，主要内容如下。（1）英法两国分别派遣了 2 万人和 1 万人。（2）有人建议放弃天津、占领南京，因为大沽附近有许多沼泽，难以进行大规模登陆。（3）也有人不赞成进攻南京，指出北塘附近有一处地方水深足够，从那里能够轻易登陆。之后可以从后方袭击大沽炮台，炮台失陷后便可占领天津，继而进军北京，大获全胜⁹⁹。

见注 5 前揭坂野正高『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139-214 页。

⁹³ 《吴煦档案选编》第 5 辑，60、61、63、306-353 页。

⁹⁴ 《吴煦档案选编》第 5 辑，310-316 页。据英国海军报告，英军共伤亡 434 人。D. Bonner-Smith and E. W. R. Lumby (eds.), *The Second China War, 1856-1860* (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1981), p. 397.

⁹⁵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 4 册，167-169 页，何桂清奏，咸丰九年六月十六日。

⁹⁶ 9 月 16 日，英国内阁批准向中国派遣远征军。11 月 16 日抵达上海的轮船带来了这一消息。*North-China Herald*, 19 November 1859. Costin, *op.cit.*, p. 299.

⁹⁷ *North-China Herald*, 19 November 1859.

⁹⁸ FO 17/335, secret and confidential, Bruce to Russell, 21 January 1860.

⁹⁹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 4 册，307-309 页，何桂清奏，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一日。《第二次鸦片战争》第 4 册 311-312 页收录的报纸汉译本，并不是随何桂清的这份奏折一起提交的。1860 年 8 月，英法联军在新河衙门发现了这份奏折的原件，连同作为附件的报纸译文一同翻译成

以上三点中，(1)的信息来源或许是在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但无法确定具体为哪家报社。(2)和(3)则是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的读者来信，《北华捷报》亦有转载。(2)的作者不详，(3)的作者则是曾在1857-1859年间担任额尔金秘书、亲自到访过大沽和天津的俄理范(Laurence Oliphant)。他没有陪同额尔金参加第二次中国远征，因此投稿中提到的北塘登陆计划并非官方意见，而只是他的个人见解¹⁰⁰。

何桂清提交的译文中并没有提及俄理范的姓名和背景，有可能译者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何人。不过，何桂清此前就曾从其他渠道探听到联军可能从北塘登陆¹⁰¹，这份译文又提供了一份旁证。对比英法两国实际派遣的人数(英军20499人，法军7620人)，可以说上述译文的信息相当准确¹⁰²。虽然还有不少翻译上的小错，也缺乏对背景知识的理解，但叶名琛希望通过英文报纸收集敌人信息的计划，至此终于实现了。

何桂清的一系列上奏都被转发给了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认为有关联军人数的信息或许可信，但坚信从沼泽环绕的北塘登陆十分困难，即使能够勉强登陆，也难以对抗埋伏在新河、塘沽等地的清军，因此判断没有必要在北塘驻军¹⁰³。

此后的事态发展与额理范的预测完全一致。1860年8月，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攻陷大沽后占领了天津，9月时逼近北京附近的通州。清廷对消息的封锁以及北京居民的不安，正如本文开头所述。9月18日，谈判破裂，约40名英法人被俘，其中包括英方代表巴夏礼和《泰晤士报》的随军记者。此后清军节节溃退，联军逼近北京城。9月22日，咸丰帝与军机大臣逃往热河。10月18日，联军火烧圆明园，以此报复清军屠杀战俘。10月24日和25日，恭亲王奕訢代表清朝，在北京城内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¹⁰⁴。

(2) 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的公开

本节的最后想要关注条约的公布问题。这是因为，《中英北京条约》共有九款，其中的第八款如此写道：

戊午年(=1858年)原约在京互换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京外各省督抚大吏(high authorities)，将此原约及续约各条发钞给阅，并令刊刻悬布通衢(print and

了英文，提交给了英国外交部。“Translation of Papers found in Sin-ho by Mr. Parkes”, on the 12th August, 1860, enclosed in Elgin to Russell, 25 August 1860, CRAC, pp. 118-119. 对比英文版本可知，何桂清于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提交的这份奏折中附带的报纸汉译本，收录在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5册，1847-1848页。

¹⁰⁰ J. C., “The Third Chinese War.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The Times*, 29 December 1859, p. 9. L.O., “The Third Chinese War.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The Times*, 31 December 1859, p. 8. *North-China Herald*, 10 March 1860. 讨论此后仍在继续。1860年1月5日的《泰晤士报》上，L. O.的署名变成了 Laurence Oliphant。

¹⁰¹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4册，274页，何桂清奏，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八日。299页，何桂清奏，咸丰十年一月二十七日。

¹⁰² 注5茅海建前揭书，366-375页。

¹⁰³ 注5茅海建前揭书，363-366页。

¹⁰⁴ Hevia, *op.cit.*, pp. 45-48, 74-118.

publish), 函使知悉¹⁰⁵。

英国特意以明文规定的形式, 要求清廷刊布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全文, 并通知全国。

全文公布条约不仅是《中英北京条约》的条款之一, 也是英军撤兵的条件。1860年10月26日, 额尔金照会奕訢, 称在咸丰帝下发布条约的明发上谕前, 他不会从北京撤军。4天后, 未得到咸丰帝回复的英国人干脆自行起草了一份明发上谕, 与催促的照会一并递交给了奕訢¹⁰⁶。在给英军指挥官格兰特中将 (Hope Grant) 的公函中, 额尔金对公布条约的重要性作了如下解释:

我认为, 要执行《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第八款规定的对条约的公布 (publication), 就和皇帝批准条约同样重要。如果在皇帝下令公布条约前就撤走军队, 那么公布可能就永远不会实现了¹⁰⁷。

在额尔金看来, 皇帝以明发上谕的形式承认条约的缔结、将条约全文刊刻公布, 是迫使清朝履行条约的必要程序。他之所以如此坚持,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清朝曾有过一次反悔行为。除此之外, 或许也是不满于西方人的存在一直在明发上谕和邸报中遭到抹杀¹⁰⁸。将条约内容公之于众, 不仅是向清政府施压的手段, 也是彰显英国人存在感的方式。

11月1日, 咸丰帝的明发上谕送达北京, 京城各处都贴出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英北京条约》的全文¹⁰⁹。11月9日, 英军撤出北京, 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此结束。

结论

本文考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各个阶段, 外交谈判和战争的相关信息如何被收集, 如何在政府内部传递, 又如何向政府外部扩散。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信息处理, 延续了1840年代以来的信息收集、共享和发布模式, 也暴露了既有模式的缺陷。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但清政府的信息处理实际上分为“内政”和“外政”两部分。内政信息除了会在政府机构内部共享, 其中的一部分还会通过邸报和明发上谕公之于众。与此相对, 外政, 尤其是涉及西洋各国的信息则基本上一律被视为机密, 主要以密奏-廷寄的形式流通于

¹⁰⁵ “Convention between Her Majesty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 signed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at Peking, October, 1860”,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ary Papers*, No.66 (2755), *Treaties between Her Majesty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Rules for Trade and Tariff of Duties*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861), p. 21.

¹⁰⁶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 217-218页, 奕訢奏, 咸丰十年九月十三日。229-231页, 奕訢奏, 咸丰十年九月十七日。

¹⁰⁷ FO17/332, Elgin to Hope Grant, 27 October, enclosed in Elgin to Russell, 31 October 1860. *CRAC*, p. 245.

¹⁰⁸ 亚罗号事件发生后, 《北华捷报》一直在关注邸报中有否提及英国。例如, 1857年10月31日, 该报转载了一份叶名琛汇报地区防卫的奏折, 其中提到了英国。编者特意评论道: “我们的存在终于得到了承认”。

¹⁰⁹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 234-236页, 奕訢奏,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同前, 第2册, 19、42、100、130页。The Prince of Kung to Elgin, enclosed in Elgin to Russell, 13 November 1860, *CRAC*, p.256-257. “The Peace with China”,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9 January 1861.

清廷核心决策层与负责官员这一狭小范围之内。这种涉外信息的共享和发布模式导致虚报与误报难以被及时发现，其结果就是虚假信息一直在封闭的回路中不断循环、积累。从亚罗号事件的发生到广州城沦陷，清朝中央政府被叶名琛的谎报和误报误导一年以上，充分说明了此种模式的弊端。

从谈判开始到天津条约正式缔结，清廷始终没有向民众公开谈判的进展和结果，也没有向中枢以外的官员们提供有关条约的详细信息。另一方面，包括不实传闻在内的零散信息则通过非正式渠道在政界传播，成为了政策讨论的素材。清政府中一直存在的主战论，除了来自华夷意识的影响，也有因信息不足而导致的对联军实力的无知。

清朝中央政府对信息的封锁不仅引起了翁心存、黄宗汉、王庆云等本国官员的混乱和不安，也引发了英国人的不满。清廷不以明发上谕的形式公布对外政策、不在邸报上刊登有关西洋事务的奏折，无异于抹杀了西方人在中国的存在。英国人竭力推动天津条约全文在中国的传播、将条约的刊行和公布明文写进《中英北京条约》并将其列为撤军的条件，既是以此强迫清朝履行条约，也是希望借此手段表明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吴煦等活跃在上海的官员开始有效地使用英文报刊来收集外国信息。虽然林则徐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便组织翻译外报，叶名琛也自认为掌握了“新闻纸”的奥义，但前者得到的译文大多文意不通、缺乏时效¹¹⁰，后者则更是对“新闻纸”为何物都缺乏正确理解。战后，从报刊上收集到的联军信息得到了验证，从此之后，收集和翻译外报便成了洋务官员们的固定工作。1862年，李鸿章被任命为署理江苏巡抚，甫一上任便下令翻译英文报纸¹¹¹。1866年的丙寅洋扰（法国武装入侵朝鲜）和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中，清政府都通过英文报纸追踪法国和日本的动向¹¹²。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契机，英文报刊开始在对外信息的收集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英文报纸上收集到的信息也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信息本身的看法。一部分清朝官员慢慢认识到，涉外信息也可以（或应该）被公开。虽然中央政府直到新政开始才主动公开涉及外政的公文，但从1860年代起，在上海发行的中文报刊便陆续刊登总理衙门的奏折并评论清朝的对外政策。至甲午战争时期，中文报刊的积极报道已经使得战争信息的传播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

¹¹⁰ 参见苏精辑著《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¹¹¹ 李鸿章（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84页，上曾制帅，同治元年四月二日。

¹¹² Mary Clab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240-241. 朱玛珑《外交情报与港际报业——以1874年台湾事件日·中两国轮船运兵消息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3期，2016）。塩出浩之「台湾出兵をめぐる東アジア公論空間」（同編著『公論と交際の東アジア近代』東京大学出版会、2016）。塩出浩之「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新聞ネットワークの形成」（『日本歴史』871号、2020）。